

病人的一把尖刀,让这位即将毕业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生倒在血泊中。原本,还有几个月,他就要去香港读博士。他想做一名不收红包的正直的医生,还希望在狼疮肾炎方向研究一辈子——

# 医学生之死

本报记者 赵涵漠



事实上,就在遇害当天中午,王浩还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那一天是他奶奶73岁的生日,“我要祝她生日快乐。”

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通电话。4个多小时后,意外发生。除王浩外,王宇医生术后诊断为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另一名医生右面部外伤,还有一名女博士生受头外伤。目前,病情最重的王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3月26日中午,当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这间斜对着电梯的医生办公室时,一切看起来普通又平静。栗色的木门依然开成45度角,来往的人们一眼就能看见王浩坐过的位置——一个磨得厉害的电脑桌。尽管事件只过去了3天,但这个科室的医生、实习生仍然不得不停留在这个房间里工作。

门外,一个外地病人用手机给朋友诉苦。病人仍旧不需要敲门就可以走进这里,询问病情,领取检查结果。到了午休时刻,这个房间终于安静下来,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

“我(对王浩)也不是恨得不行了。”赵彦萍停顿了一下又说,“他还只是个孩子。”

而李宏颖则闭上眼睛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着自己见王浩的最后一面。23日下午4点半左右,她刚刚吃完饭走向医院大楼,突然看见,医生们推着一个轮椅上的伤者飞快地向前跑,大喊着:“急诊!让!让!”

伤者仰着头,血流满面。这使得她没有发现,那人就是与自己一起实习了3年的同学王浩。她也没有看出伤者猩红色的袍子曾是纯白色的,“全是血,他的衣服上全是血。”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唐莹为化名)

轻人上课时总是坐在阶梯教室面对讲台正中间的位子。期末考试前,他的笔记最厚、最全,教科书上也画满了老师讲的重点。200多人的大课,很多人会抢着复印他的笔记,后来,王浩干脆留了一份笔记在复印室。

平时,他讲话温柔,富有绅士风度。但朋友孙心毅却发现,只要谈到医学,他就会变得“滔滔不绝、眉飞色舞”。

可在3月23日傍晚,他却没能给世界留下一句话。倒在血泊里的王浩并没能令李梦南停手,据一位目击者向媒体回忆,那个未满18岁的少年又袭击了另外三人,他甚至绕着桌子挥刀追砍一女医生。

仅仅就在两三分钟后,李梦南逃跑。王浩被抬上轮椅,直奔重症监护室。几十个医护人员就守候在监护室外,走廊里一片哭声。

当时也守在那里的同学李宏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事后想起,当时按压、抢救了那么长时间,监测仪器上的数字却没有改变,他们完全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可是,抢救仍在继续。

直到最后,监护室里的人绝望地看到,“输进去的血全从刀口里流出来了”。家人后来得知,其实就在遇害后的十几分钟,王浩就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

接近两个小时,一位护士长从监护室里走了出来,她哭着让“大家冷静一点”,“现在得拔管了”。

这也意味着,抢救结束,宣告死亡。这也是儿子最后的时光,王浩的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流泪。从儿子租住的小屋里整理的遗物,如今就堆在他身后。

与朋友们描述的“浩哥”很像,他的家当再简单不过了——一部没有装游戏和电影的笔记本电脑、几麻袋书、半麻袋衣裤鞋袜、小半米高的手写笔记、一摞摞的复印资料、几幅毛笔字。

他的房间里有两个衣柜,一个早已被书塞满。另一个里面挂着一套牛仔仔裤、一件T恤、一件衬衫以及一套只有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才舍得穿的西装。在家人看来,“空荡荡的,让人心酸”。

除此之外,他只有一个灰色的熊宝宝暖手包了。

## 世说新语

在人大前无古人地参政58年,领导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申纪兰是铁打的兵。

# 申纪兰何以如此大方

被人冒名发财,如果这事搁在姚明身上,早摊儿了。但申纪兰没有。

申纪兰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人,1952年24岁,加入村合作社并当选为副社长。当时的妇女是不下地的,申纪兰却动员村里的妇女参加劳动,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一个是破除女主内男尊女卑的传习,如此看来,申纪兰算是改革者,犀利。

1953年申纪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之后担任过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如今申纪兰83岁了,从1954年第一届到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她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这在中国政坛可能是独一无二的。领导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申纪兰是铁打的兵,她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胡耀邦、李鹏、胡锦涛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人大前无古人地参政58年,申纪兰的名气大大的。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的名气是有货币价值的,在企业这叫商誉。1983年卸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后,申纪兰没有留在太原养老,而是回到西沟村。平顺是全国著名贫困县,申纪兰凭着自己的名气,到处给村里找项目。她曾找过河南七里营刘庄的史来贺和天津静海大邱庄的禹作敏,那时大家同是风头人物。但项目不好找,搞了个铁合金厂,半死不活。

无奈,申纪兰第一次向上要钱。1995年,西沟乡党委书记李培林得知姜春云副总理要来西沟,便让申纪兰向姜开口求助。申纪兰并不情愿,但拗不过乡亲,她对姜春云说:“西沟的山变了,有树了;河变了,有地了;就是上个企业办不成,引资引不上,合办没人来。”随行的财政部官员立马答应给500万元无息贷款。

几句话就拿到500万优惠贷款,这主要是中央财政有转移支付功能,但这500万如此精准快速地落到西沟村,当然也要靠申纪兰的面子。不信让李培林去试试,可能连搭话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名气的货币价值。

其实,从宏观角度来看,西沟村建铁合金厂并不合理,以致虽然有了这500万元,但仍奄奄一息。刚开始市场好,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第二年起就差了,产品一直在调整,炉子也时停时点。按今天的说法,这个村办企业属于规模小、效益差、高耗能、环保落后、缺少核心产品竞争力的项目,理

应淘汰。但谁有权限阻挡西沟农人发家致富的步伐?何况那里还有申纪兰这样的名人。

申纪兰一再为自己的“中介”行为找根据,她说:“有些地方说话比你起作用,需要我出面我就去。咱是为发展又不是弄腐败,不丢人。”申纪兰聊以自慰的是,这些企业都是集体的,她个人没拿一分钱好处。她似乎站在了道德的高地:我将个人名气无偿地让渡给了村委会。

但是,申纪兰的名气是谁给的?是西沟村村委会吗?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实有代表2978人,其中官员和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16人(包括农民工3人,广东胡小燕、重庆康明和和上海朱雪芹),农民代表13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主)。虽然申纪兰是个退休的地厅级干部,每月有几百元的政府补贴,与普通农民不同,但她似应是农民代表,她到底是生活在村里,是极为稀少的农民代表中的一员——是全国人民排出了申纪兰的名气。

申纪兰总是无私贡献着自己的名气。她代言了襄子老粗布,村里出品了纪兰核桃露。甚至早已与申纪兰无关的企业也打着她的大旗,比如纪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改名山西和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公司网站,申纪兰的头像照片不停地滚动展示。对此,申纪兰并没有采取法律行动维权,大方。

但是,如果谁要如此打姚明的主意,没门儿。相对应,姚明赚了钱,会在美国NBA、教练、中国篮协、上海队、姚明经营团队(相当于申纪兰的西沟村村委会)之间分配,精细明了。但申纪兰不,她把全国人民给她的名气只给了自己的经营团队,并无视旁人冒名发财。

如果申纪兰的名气不是全国人民给的,不那么宏大遥远,而像姚明一样,主要是自己创造的,她还会那么大方吗?



摄人



就应该有医生的样子。”人们后来这样推测。

在大学的某段时间里,他也曾像很多医科生一样迷上日剧《白色巨塔》,可接下来的讨论气氛却不那么融洽。

“财前医生可真厉害,技术特别好。”同学说。

“你怎么能喜欢他呢?他为了钱可是不择手段。”王浩显得有些惊讶,“我喜欢里见医生,他很正直。”

这并不是王浩唯一一次描述自己心目中理想医生的样子。在朋友们看来,他做人纯粹,“黑白分明”,简直“像从古代穿越过来的”。王浩曾经告诉唐莹,“等我当了医生,一定会对患者很好很好,绝对不收红包和回扣。”

可事实上,他并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遇害前,他仅仅在风湿免疫科度过了3年实习时光。

据哈医大新闻中心称,经警方初步审理,李梦南出生于1994年5月,父亲是服刑人员,他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去年,李梦南就曾因患强直性脊柱炎前来住院治疗。23日上午9点多,他再一次在爷爷的陪同下来到哈医大一院。

他们在饭店里欢度平安夜,嬉笑着与圣诞老人合影时,我始终因为下午临时作出的决定而心神不宁。人生的轨迹,也从此开始与以往的规划不同。

回校之后,我在清华招生网站上疯狂寻找喜欢的导师和专业,并选定目标。为一改自己已不学无术的叛逆形象,甚至剪去齐肩长发,以示从良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那短短的碑文似乎唤醒了一颗浑浑噩噩的心,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一味依赖并依附于所受的教育而缺乏独立思考的自由,外表上无论怎样叛逆,都是一种浅薄。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浅薄,我进入清华的初次努力失败了。师友劝我另走他路,但我内心执著地认为,我注定与清华有缘,不然不会无缘无故径直走到王国维纪念碑前。我只是一再告诉他们,我要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他们无不摇头叹息。

后来回顾当年的历程,自己才恍然大悟,那所谓的“缘分”,不过是困境中所需要的一种心理暗示。对于一个固执的人,想要做成某件事情,哪怕再牵强,也会找到一个借口,苦苦坚持到底。年少无知,李梦南,其实想登上的是清华这个舞台,



内心的好奇渐渐被沉重所代替;再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差点儿让我陷入沉思。同伴的呼唤声,让我回过神来。但在抬脚离开石碑那一刻,我已经作出决定——进入这个校园求学。

当晚在饭店里欢度平安夜,嬉笑着与圣诞老人合影时,我始终因为下午临时作出的决定而心神不宁。人生的轨迹,也从此开始与以往的规划不同。

回校之后,我在清华招生网站上疯狂寻找喜欢的导师和专业,并选定目标。为一改自己已不学无术的叛逆形象,甚至剪去齐肩长发,以示从良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那短短的碑文似乎唤醒了一颗浑浑噩噩的心,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一味依赖并依附于所受的教育而缺乏独立思考的自由,外表上无论怎样叛逆,都是一种浅薄。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浅薄,我进入清华的初次努力失败了。师友劝我另走他路,但我内心执著地认为,我注定与清华有缘,不然不会无缘无故径直走到王国维纪念碑前。我只是一再告诉他们,我要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他们无不摇头叹息。

后来回顾当年的历程,自己才恍然大悟,那所谓的“缘分”,不过是困境中所需要的一种心理暗示。对于一个固执的人,想要做成某件事情,哪怕再牵强,也会找到一个借口,苦苦坚持到底。年少无知,李梦南,其实想登上的是清华这个舞台,

看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当穿着白色医生袍的王浩开始值班时,他并不知道,不远处,17岁的少年李梦南和一把尖刀正在逼近。

王浩只是安静地坐在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里距门口最近的位置,面朝墙壁。然后,甚至连一丝求救的声音都未能喊出,3月23日下午4点半左右,李梦南的水果刀插进了王浩的喉咙,割断了他的大动脉。这位即将毕业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生,倒在血泊中。

3月26日,王浩实习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他布置了一间安静的灵堂,人们红着眼圈来此献花、悼念。一个此前与他并不相识的本科生特意从家里赶来,走进灵堂前,这个穿着便服的女孩有些担心:“我来不及穿‘白服’(白大褂),这样会不会不够庄严?”

人们都知道,照片里那个28岁的年轻人再没有机会穿上心爱的“白服”了。而在一些同学看来,“他那么喜欢医学,那么想当医生,本应该是我们中最有前途的一个。”

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他就通过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博士生面试。从香港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也许就在这些天抵达,他会在8月份前往那座城市,并获得每月1.6万港币的奖学金。他未来的导师T M Chan从新闻里得知王浩遇害后发来邮件,“多希望这不是真的。我们一直在等待他到这里读博。”

按照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规划,他将在香港读博,未来还想去美国做博士后。朋友们都记得,王浩一直信心满满,“我喜欢风湿科,这里有太多疑难杂症了,我要多做实验,把这些病因都找出来。”

但如今,梦想被永久搁置了。

3月24日一早,有人悄悄在他办公桌上了放了11枝白菊。“我们都觉得,白色就是最适合他的颜色。”朋友孙心毅低声说。

这个身高1.82米的年轻人喜欢白色,也喜欢穿白衬衫和白球鞋。朋友唐莹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王浩的白球鞋总是“每日一刷”,白到连女孩子都不敢脚和他比。

在亲友眼里,他最喜欢的,却是自己白色的医生袍。父亲和弟弟还清晰地记得“白服”装进行李,带回内蒙赤峰老家,让家人看看自己穿白大褂的样子。

他是个瘦高个儿,戴着金属框眼镜,脸上总带着笑容。“帅极了!”50多岁的父亲红着眼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还有一次,学生们都穿着“白服”走在校园里,一个同学开玩笑似地搭了一下王浩的肩膀,却被他立刻推开了。然后,王浩指了指穿在身上的医生袍,一语不发地大步向前走去。

“他的意思或许是,穿着这件衣服,

## 影响着

王 波

第一次知道王国维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考场上绊了我一下。语文考卷里一道填空题,要求填《人间词话》的作者。

对于小县城的高三理科生我来说,无论是《人间词话》还是王国维,都属于知识的盲点。“国学大师”、“清华四大导师”等名号,更是闻所未闻,远不如我眼前的江边流水和天上浮云真切。在这怪僻的考题面前,我跌倒了,心里总抱怨出题的老师真是莫名其妙,把题出得这么偏。

很快,我就发现抱憾无济于事。这个叫王国维的人本本加厉,屡屡出现在语文考卷的阅读理解里,大谈古今成大事者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一介乡野小青年,在当时实在无法理解,这些我眼里潦倒文人的愁词怨调,怎么一转眼到他嘴里,就成了为人处世的大道理。看着试卷上的大红叉叉,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鄙夷地浮起四个字——“故弄玄虚”。

话虽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啃下了老师指明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因为老师一再强调,考场如战场。而我,只想考个高分。我第一次牢牢记住考卷上那个难缠的王国维,更像是一个遭遇过小挫折的高中生功利性的投机。

随着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名工科学生,不再有语文考试,我以为此生与王国维无缘。现实却再次戏弄了我。

2001年12月24日下午,我们师生十余人以考察的名义,在清华大学与十余名清华师生座谈后,集体参观清华校园。行至大礼堂和清华学堂,我不禁开始艳羡清华学生能有如此别致的校园。

当众人在“行胜于言”的日晷处轮番合影时,我去上厕所,不知不觉竟走到一座斑驳的石碑前。定睛一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高三时痛苦背下的知识,这时派上了用场。怀着“不是冤家不聚首”的心情,我转到背面看碑文,

看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 点评

李斐然

吕青海:落马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部新片,叫做“市长42天”。故事的开头荡气回肠:去年7月9日,男主角吕青海以303票全票当选河南漯河市市长。在掌声中,他发表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任何一个政府领导干部,只要他不能执政为民,解决不好自身廉洁问题,都应该‘下岗’。”

吕市长说得太好了。没错,秉公执法的政府就得这么做。正是如此,纪委的同志在吕市上任42天后,来到了政府会议现场。他们耐心地听完了市长的上半年工作总结,可实在等不得他“部署下半年工作”,就以“涉嫌严重违法违纪”将其带走“双规”。

这部新片最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上映场所,不是电影院,而是真实的官场。不过我敢打赌,即便它能上映,也一定不卖座——以为是个正剧,可故事结局堪比恐怖片,我想谁也不想看第二部。

## 警察:错位

小时候玩游戏,大家都爱扮警察。因为警察跟坏人斗智斗勇,总有办法破案。你看人家河南三门峡市森林公安局的三名警察,就很有想法。所在大队的办案情况老是排列数第一,三个人合计了一下,不就是抓坏人嘛,卖根雕的老吉看着挺合适的,不如就让他“犯法”吧。

于是,他们给老吉编了一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的罪名,还正儿八经地组织了一场抓捕,这场办案游戏大功告成。可是,检察院可不玩游戏,厉声叫停:犯法的是老吉,而是这群号称在“执法”的人。

游戏终于告一段落,老吉无罪释放,三名警察却也免于刑事处罚,副局长还有乌纱帽,警察也还穿着蓝制服。原来小时候的游戏一直玩到今天,可我记得这游戏的规则是,警察要除暴安良,罪犯要接受惩罚,在公正面前,谁都不能耍赖皮。

## 撑伞女孩:无名

不知道武汉人老郭是不是和戴望舒一样,幻想过自己会遇上撑着伞的南方姑娘。只不过这一场相逢没有诗情画意,下雨的深夜他骑车摔伤,昏倒在路中央,等他苏醒时,发现自己已经坐到了路边,身边还有一直为他撑伞挡雨的两姑娘。

撑伞左眼青的老郭已经不记得她们的模样,也没问出她们的名字。老郭猜她们是赶着回宿舍的女大学生。他很想再当面谢谢她们,如果没有这两位好心人,说不定自己会成了第二个小悦悦。

没有名字,没有地址,甚至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脸。不过我知道,想找到这样的人并不难,在下一个需要帮助的关口挺身而出的人,可以是我,也可以是你。

## 平井秀和:吃大米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潜在的核污染可能是挡在他们和食用福岛大米之间不可撼动的围墙,但是在日本老人平井秀和看来,只要一个理由就能推倒这堵墙——为了孩子。

这个68岁的老人希望,全日本的老人都能联合起来,把所有福岛大米都吃光,因为只有这样,下一代才不会吃到这些“坏东西”。

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不是明白那些满足生僻字的“放射性物质”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心疼孩子的好父亲,如同疼爱我们的长辈一样,他把鱼肉让给孩子,骨头留给自己。对他来说,世界的规则非常简单——你快逃,我掩护。

虽然不想伤这位老人的心,但是我必须说,这真是个好主意。在一个某些机制“生病”的国家,或许并不需要这种悲壮的形式。更何况,犯下错误的并不是这些两手空空的平民,这些苦果就不应该由那些无辜的胃来消化。

